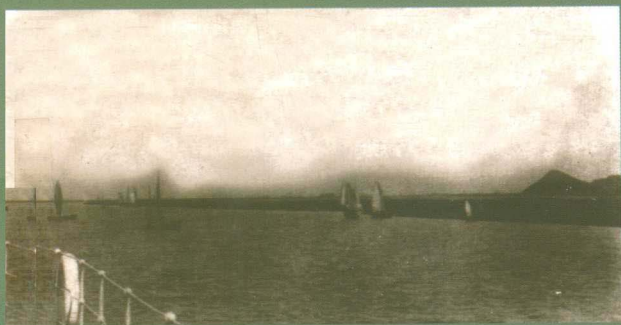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1862 年上海日记

【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 著
陶振孝、阎瑜、陈捷 译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主 编：张明杰

副主编：王 成 陈 捷



1862年 上海日记

【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 著
陶振孝、阎瑜、陈捷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62年上海日记/(日)日比野辉宽等著;陶振孝,阎瑜,陈捷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2.8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ISBN 978-7-101-08524-2

I. 1… II. ①日…②陶…③阎…④陈… III. 游记-作品集-日本-近代 IV. I3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8154号

-
- 书 名 1862年上海日记
著 者 [日]日比野辉宽 高杉晋作等
译 者 陶振孝 阎瑜 陈捷
丛 书 名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¼ 插页2 字数26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524-2
定 价 38.00元
-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抵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

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 13 人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 1905 年前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的东京汇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 227 种，其中晚清的 148 种，民国时期的 79 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都教育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 227 种游记在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早在 80 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就收录了《早期日本游记五种》。90 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专著多达数百部,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 1980 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截止至 1979 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此可以察知,这些游记的数量之多。而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即大致相当于晚清民初时期的尚有许多遗漏。这固然由于这一时期距今时间久远,不少游记已很难寻找,一些书甚至已成孤本;而且收藏者又很复杂,除图书馆或特殊文库外,尚有不少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因此,全面收集这些游记本身甚为困难。可喜的是,日本游摩尼(ゆまに)书房于 1997 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游记 65 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所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本。笔者十余年来,一

直致力于日本人所写中国游记的收集和考察,目前我个人收罗或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大大小小已不下三百余种,以后将择其精者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前面提到,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 1871 年的订约建交。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的打算,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迟迟至 1877 年末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1872 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和福州领事馆(领事井田让未赴任),同年 8 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我国东北侦探考察。早在前一年政府就派福岛九成等九人赴中国留学。1873 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等八名陆军留学生赴中国。1874 年 8 月在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出兵台湾相呼应,大批军人进入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1875 年 2 月,受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至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东京丸”等四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 8 月,共同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芝罘—天津—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大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渡航。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进出。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

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游记。

当然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价值不大,有的甚至是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有价值者。不少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学校修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游记最多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该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书,如《旅行纪念志》(1911)、《孤帆双蹄》(1912)、《乐此行》(1913)、《沐雨栉风》(1914)等,即第8期至11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同文会于1916年至1920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就是根据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几本这方面的译稿和著述。

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以明治、大正时期为例,这些撰写者从身份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5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进而翻越秦岭,横断栈道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8月抵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序。另外较有

代表性的还有：大鸟圭介《长城游记》（1894）、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1888）、村木正宪《清韩纪行》（1900）、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年版，实为1910年之行）等。

第二，学者及记者、编辑。这类游记较多，如曾历任过《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于1899年9至11月游历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燕山楚水》（1900）。另有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1884），尾崎行雄《游清记》（1884），户水宽人《东亚旅行谈》（1903），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中国漫游记》（1918），桑原鹭藏《考史游记》（1942年出版，实为1907—1908年之行），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1911），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1918），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1912），那波利贞《燕吴载笔》（1925）等。

第三，作家或艺术家。如曾被胡适称为“新派小说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1921年3月末至7月初，前来中国。从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九江、汉口、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最后由天津经沈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华期间还拜访过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并在游记中分别记下了对前四人的访谈录。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游记》（1925），即这位年轻作家留下的民国十年时的中国印象记。这类游记还有：鸟谷又藏《中国周游图录》（1914）、夏目漱石《满韩漫游》（1909）、河东碧梧桐《游中国》（1919）、佐藤春夫《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1922）、木下李太郎《中国南北记》（1926）等。

第四,教习及留学人员。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遗产。如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濂敏德的《北清见闻录》(1904)、先后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1904)、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等。留学人员的游记有从师于俞樾的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1883)、后藤昌盛的《在清国见闻随记》(1884)等。这类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的留学时的身份是学者,则列入第一类型,如桑原鹭藏、宇野哲人等。

第五,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如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于1874年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两年后又派到中国从事谍报等活动,1878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1874)、《北中国纪行》(1875)等,即其游历之记录。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岛弘毅《满洲纪行》(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年版,实为1919年内蒙古东部及洮南地区的旅行日记)等。

第六,实业家或商人。如实业家木村桑市《北清见闻录》(1902)、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1899)、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中国实见录》(1910)、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的永井久一郎《观光私记》(1910)、在天津经商十余年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山本唯三郎《中国漫游五十日》(1917)等。

第七,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

分活跃,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入大陆的所谓“中国开教”。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份在北京龙泉寺从本然师学北京话。《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1873)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1904)、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来马琢道《苏浙见学录》(1913)、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1916)、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等。

第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1884年5月至翌年4月前来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北京,最后入广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昶、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1886)是了解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绝好材料。另外,山本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1899)也是这类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的两部纪游与前面提到的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

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份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

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而且,这些游记多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 1871 年至 1920 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 1862 年“千岁丸”航渡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相信贤明的读者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诸多启发和思考。这也是笔者企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张明杰

2006 年 10 月于东京

“千岁丸”略记

1853年(日嘉永六年、清咸丰三年)的“黑船来航”及次年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正式结束了日本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锁国状态,幕府逐渐把对外贸易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开始派使团、商人出访西洋及中国。在资本主义西方大举入侵东亚的情势下,感同身受的日本人力图从中国那里获得世变信息及应对世变的经验教训,因此日本自江户幕府末期以来就十分关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状况,19世纪60年代以来四次遣使上海,均留下了大量调查材料。

1862年(日文久二年、清同治元年)日本幕府首次派出官方贸易商船“千岁丸”前往中国上海。这是自1854年实施开国政策以来,幕府第一次向中国派遣官船。在锁国时期的长崎,从中国来的商船贸易非常盛行。但是,日本人渡航前往中国是被禁止的,除了自己漂流过海,去中国正式参观访问是时隔两个世纪以后的事情。

乘坐“千岁丸”而来的官员、武士、商人等51位日本人考察了上海这座远东较早步入近代的大都市,了解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情形,调查了此时上海周边太平军与清军激烈交战的状况,并将这些情况用纪行文的方式记录了下来。主要纪行文如下所示: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

峰洁:《船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

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

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

日比野辉宽：《赘疣录》、《没鼻笔语》

名仓信敦：《海外日录》、《中国闻见录》

这些记录从外国观察者的视角，展现出晚清中国各个层面的景象，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中国，是研究 19 世纪中叶上海的社会状况、西方列强侵华情况、太平军与清政府交战情况，以及日本人中国观变迁的重要史料。

1862 年 5 月 29 日（日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千岁丸”从长崎出发，历时八天，于 6 月 6 日（日文久二年五月六日）到达上海，在上海逗留至 8 月 3 日（日文久二年七月四日）。

幕府此次中国之行是想促成贸易合作。自宽永以前的红章船^①以来，现在的官吏依然不通商法，因此英国人和荷兰人欲介入其中，日本官吏只是观望商法形式，作他日之谋。

“千岁丸”是幕府为了前往中国，用洋银三万四千枚购买的停泊在长崎港的“阿米斯迪斯（Armistice）”号英船，船长二十四间^②，宽四间四尺，深两间五尺。此船购入后，命名为“千岁丸”。船长是英商亨利·理查德逊（Henry Richardson），他由“阿米斯迪斯”号的船长变为“千岁丸”的船长，主要从事上海与长崎间的贸易。

遣清使节团以官吏为首，官吏共九人，分别是会计根立助七郎（陪同为会津藩的林三郎、肥前藩的纳富介次郎），调查官代理沼间

①指日本从近世初期到锁国时期领有红色官印许可证从事国外贸易的船只。

②间：日本尺贯法中的长度单位。一间为 1.818 米。

平六郎(陪同为深川长右卫门、松本卯兵卫),会计总管金子兵吉(陪同为日比野辉宽、伊藤军八),士兵监察锅田三郎右卫门(陪同为木村传之助、滨松藩的名仓予何人),主管中村良平,普通监察盐泽彦次郎(陪同为肥前藩的中牟田仓之助),普通监察犬冢荣三郎(陪同为高杉晋作),编制外官员中山右门太(陪同为山崎卯兵卫、樱木源藏),审判官代理森寅之助。还有记录员松田兵次郎,医师尾本公司,唐国翻译周恒十郎、蔡善太郎,荷兰翻译岩濑弥四郎,药品鉴别渡边与八郎,商人永井屋喜代助、松田屋伴吉、铁屋利助。除此以外,还有船内伙食雇工六人(嘉市、吉藏、嘉吉、清助、善吉、兵吉)和水夫四人。乘船成员中,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荷兰商人、英国船长及其妻子等,共六十七人。

其中,《游清五录》的作者高杉晋作(1839—1867)为长州藩士(俸禄150石的下级武士),号东行。二十四岁时,文久二年正月二日奉藩主之命前往中国,第二天随幕府官吏从江户港出发,四月二十九日从长崎启航,五月六日进入上海。七月六日从上海返程,十四日抵达长崎。这期间的亲笔记录草稿,分为《航海日录》(由《航海日录(A)》、《续航海日录》和《航海日录(B)》组成)、《上海滞留日录》、《长崎滞留杂录》、《内情探索录》和《外情探索录》五个部分。

《唐国渡海日记》的作者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1831—1880)在著述中,详记此行的商事活动,从在日本办货、货品在长崎装船,到与清方在上海交易,均逐日记述,并具体列目记载从长崎运往上海的日本商品,以及从上海购回长崎的中国商品,提供了当年日中双边贸易的翔实材料。

随团医师尾本公司的随从峰源藏,又名峰洁(生卒年不详),大村藩士,兰学家,熟悉天文学和测量学,所撰《船中日记·清国上海见闻录》,图文并茂,记述详细。

下面主要参照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峰洁的《船中日记·清国上海见闻录》和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的内容,来鸟瞰一下“千岁丸”乘员留下的珍贵记录。

一、九死一生到达上海

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官吏以及随从人员都上了船。四月二十九日清晨,“千岁丸”在长崎港起锚了。最初两天还算顺利,但是五月一日这天下午四点左右开始,狂风暴雨交加,“大浪拍打过来,落在甲板上,发出像砸下大石头般的巨响。全船的人没有不晕船的。凌晨两点左右,船剧烈晃动,犹如山崩,除了放在房间里的随身携带的物品以外,有的货物凌乱不堪,没了原来的形状。陶瓷器自不用说,甲板上的炉条、炭炉等严重受损。日本人没有一个人能上到甲板上的。这是古今罕见的大风。大家都已经死了心,做好了没有救的思想准备,逐渐悲伤起来”^①。可见乘员们在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实属不易。

五月五日,“千岁丸”到达了吴淞江上距离上海五里的地方。“唐国渔舟非常多,数也数不尽,看起来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②次日到达上海港时,更是令乘员大开眼界,惊异万分。“这是中国最繁华的港口。欧洲诸国的商船、军舰数千艘在此停泊,成

^①参见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五月一日”记述。

^②参见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五月六日”记述。